

# 纪念鄂西解放四十周年

专辑之二

《鄂西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

一九八九年第二辑

游击江南 牵制敌人

王定烈

同仇敌忾 铲除匪患

第一集

追捕逃亡分子

第三辑

人民公仆周敬学

姚守训

解放初期的财经工作

王家田等

回忆「革干」第一期

言可

# 前 言

州政协主席 杨久富

今年十一月一日至十八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境四十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日子，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于去年9月曾编辑出版了一本以记述鄂西南战役为主体的“鄂西解放纪念专辑之一”（即《鄂西文史资料》第六辑）。今年正值鄂西解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又编辑出版了这本以记述接管建政，建立革命新秩序为主体的纪念专辑之二（即《鄂西文史资料》第七辑）。

对于一个曾经参加过解放鄂西的战斗，又在鄂西这块沃土上工作了四十个春秋的普通革命战士来说，我深感解放鄂西，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来之不易，开创鄂西历史新纪元，建设一个新鄂西更为艰辛。人老爱忆往事，更恋故人。近年来，我听到和看到曾与我们共同战斗过的一些老首长、老战友相继去世，更激起我对故人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怀念。同时也联想到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发生在青少年中的种种问题，促使我深思：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离战争年代越来越远了。但他们要从事或将要从事的事业却与老一辈打天下的事业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比打天

下更难啊！老一辈那种开天辟地、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可贵品德，后辈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忘掉，并应当作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发扬。我们这些人是从战争年代走上和平建设的幸存者，更要珍惜过去，勇于开拓未来。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正是为这一目的而工作的。我们编辑出版这两本纪念专辑，旨在使读者透过这一“窗口”，去窥视飘逝了的历史云烟，重温历史旧梦，做到以史为鉴，从而加深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这一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的认识，激励人们踏着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把我州建设成繁荣、富裕、文明、先进的自治州而不懈地工作。

这本纪念专辑，共搜集了34篇文章，约计18万余字，基本上都是作者本人亲自经历或亲见亲闻的纪实。史料价值可贵，事迹亲切感人、翔实具体，可歌可泣，是一本十分珍贵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生动教材。阅读它，会使人们更加珍惜革命前辈开创的业绩，振奋精神，开拓未来。

本专辑在搜集、整理资料过程中，得到许多老同志、老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州政协向所有为《鄂西文史资料》出版付出过艰辛劳动的同志们表示热诚的谢意！

# 目 录

游击江南 奎制敌人	王定烈( 1 )
江南游击纵队在鹤峰	徐善道( 16 )
王明元殉难	杨 季( 21 )
惶惶不可终日的三个月	梁明远( 26 )
“鄂西剿匪”篇的编者话	编 者( 33 )
同仇敌忾 铲除匪患	郭一凡( 35 )
——王定烈将军话当年鄂西剿匪	
鄂西南剿匪的回顾	肖 健( 44 )
追捕逃亡分子	万 程( 49 )
人民公仆周敬学	姚守训( 57 )
——回忆我区第一任专员	
彭书记的号召力何其大	陈尊烈( 65 )
解放初期在来凤县工作的回顾	徐达三 霍震 耿新斗( 68 )
组建巴东县人民政权纪实	白 圭( 74 )
咸丰县人民政权初建时的简记	何本章( 80 )
解放初期恩施地区的财经工作	王宗田等( 86 )
战斗在巴石公路线上的养护工	姚守仁( 97 )
解放时的鄂西公路运输段	徐载仁( 103 )
地委第一个农村工作队	阮季平( 110 )
回忆“革干”第一期	言 可( 121 )
春风雨露育新人	胡 挠( 134 )

奔赴鹤峰斗争的第一线	黄贤美(138)
“革干”生活纪实(日记摘登)	冯声举(141)
忆“军干”三三事	白虹 邹今魁(160)
投考“财干”的前前后后	吴国宪(166)
创建报社记实	吴韦(173)
组建八县新华书店始末	朱金相 姚诚(181)
解放初期的恩施高中	刘厚章(188)
恩施县文教事业的恢复与开展	万汉民(198)
鹤峰中学的新生	鲁祖鸿(206)
溃逃三千里 起义得新生	田天铎(210)
覆灭前的表演	谢诚(229)
解放前夕在恩施的两所军政干校	班杰(238)
朱鼎卿溃逃太平场的见闻录	赵璧(246)
张希周投诚	黄树庭(249)
“烂八团”遭截目略记	黄儒学(253)
“反共救国军”的出笼经过	瞿波平(256)

# 游击江南 牵制敌人

王定烈

编者按：王定烈同志曾任江南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员。本文系王老所撰写的《革命斗争纪实》中的一部分。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调集30万人的兵力进攻我位于豫鄂边的中原军区部队。1946年6月29日、30日李先念率部突围。为牵制敌人，李人林奉命率江汉支队，留在鄂中坚持游击战争三个多月。为减轻敌人对我华北战场、鄂西北战场和陕南游击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于1947年1月22日，以远距离的奔袭，突破长江天险，进入江南。与此同时，中原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才千率领分区机关和分区主力第四团（团长王定烈）于2月14日从古老背渡过长江，进入江南。3月3日，两军于鹤峰、五峰交界处的红芋坪胜利会师。会师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队”，由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王定烈为第四支队司令员。江南游击队在湘鄂边转战了3个月，经历了大小战斗近百次，歼敌3000余人。纵队本身兵力由1600余人增至2000余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和政策，以及解放军的具体形象，在湘鄂边人民心中扎下

了根子，广大群众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曙光。它为1949年11月解放恩施，解放整个湘鄂边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它是鄂西南战役的前奏曲。江南游击纵队在解放战争时期立下的伟大功勋，应载入史册。鄂西各族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党我军这段光辉历史。

## 甩开重围 挺进湘鄂西

要同敌人兜“大圈子”，在鄂西北狭小的山区，敌人云集的条件下，甩开敌人的围堵、追击，困难较大。

我们决定：留下原荆、当、远的两个连，由县长王展，县委副书记王克强、范明甫等同志率领在原地区活动。张才干同志率领我团和五团分头由沙市、宜昌之间南渡长江，把敌人调出去。

在此之前（即1947年1月21日），由李人林同志领导的江汉支队，为执行中共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方针，以远距离的奔袭攻占了郝穴以后，即由郝穴渡过长江到达枝江以南地区，并更名为江南游击支队，李人林同志任司令员。

2月13日1时，我从观音寺附近（当阳以北）出发。在泥泞的道路上冒雨进军，一天行程140华里，黄昏到达龙泉铺附近宿营，跳出了敌人合围之外。

临出发前，王树声同志化装便衣，离开部队回华北解放区去了，鄂西北已无统一领导，完全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为了暂时迷惑敌人，我们规定在渡江之前，对外不做宣传工作（不写标语、不开群众会，对敌伪人员冒充国民党军队）。当我部宿营之后，龙泉铺乡公所派乡丁来侦察，假意说：“贵

军是那一部分？看需要多少粮草？”我警戒回答说：“我们是‘国军’199旅，今日已天黑不需要粮草了。天明我们派人去乡公所，你们先回去准备。”骗走了敌人。

14日拂晓，我部继续南进，在鸦鹊岭以东通过汉（口）宜（昌）公路。事先派侦察员在小店上，故意谈论：“我199旅如何如何……”

大约10点钟左右，我后卫部队刚走完，发现鸦鹊岭出来300余敌人，沿公路东进。此时宜昌起飞之敌机也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怀疑已被敌人发觉，就地停止观察动静，如敌人向我摸来，则歼灭之后再走不迟。等了一会，看敌人的部队也停止了，并派出便探前往于我通过之点。等便探返回之后又继续前进了。看来，敌人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它既不来，我为了争取尽快渡江也不想打这个仗。吃了中饭我们就向古老背前进。

古老背，是宜昌东南40里长江岸上的一个镇子，那里只有敌人乡公所的二、三十条枪。

我们下午5点钟到达，前卫连（九中队，原军区警卫团一个连）先去收拾乡公所。敌人根本不知道是谁的部队。站门岗的哨兵还向我敬礼呢！其余敌人都把枪挂在墙上，在院里做游戏。我军冲入把武器全部收缴，未放一枪。我们抓紧时机渡江，这次可有的是船（停泊了百余只），不到两小时，我们1200余人就到达南岸（红花套附近）。当我们向船工付完工资，宣传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敌人的什么“江防船队”才由宜昌开来，已是“马后炮”了。

顺利地渡过长江，并没有解除当日的困境。因为，我们正好处在长江和清江的夹角之中，宜昌之敌一出动，就会使我处于三面临水的不利形势。为了摆脱这种地形，又继续出

发到偃家沱（清江上渡口），并挑灯夜渡。直到2月15日8时才全部渡过清江。9点钟了，宜昌之敌才抵达北岸向我们打枪放炮，又是一个“马后炮”。我不予理睬，美美地让大家睡了一个好觉。一天一夜行军160余华里，渡过两条大河，确实是够疲劳的了。

记得，我在从红花套到偃家沱的夜间行军中，虽然走得并不慢，两条腿在不停地运动，而眼皮却睁不开，一面走着一面在做梦。只有猛然碰上前面战士的背包或碰上什么别的东西的撞击才苏醒过来。走不上几步，又迷迷糊糊地做起梦来。在偃家沱吃了一顿最香的晚餐。部队正在过渡，我们叫开一家小饭铺，店老板听说是新四军来了，急忙设法替我们煮吃的。可是，什么吃食都卖光了，只有几斤包谷粉，他替我们很快煮熟，并一再表示歉意。我们却十分满意地吃着包米粉与辣椒掺和的糊糊，连连感谢他的厚意。这是因为：军民之情的感染，也确实饥饿之故。

16日以后，我们继续南进，经渔洋关、子良坪进入湘鄂边境。

敌人并未放弃对我的追击。66师（宋瑞珂部）之198、199旅尾随渡江。原守备在武昌至岳阳一带之敌33旅（段海州部）以两个团由津市石门西进。原守备在川鄂湘黔边之敌整编56师（潘文华部）163、164旅、新17旅及湘保安旅由西、南、西北，又形成合围之势。

这时，才发觉原拟分路渡江的五团，并不按计划行动。他们独自（违背工委的决定）渡过襄河，经枣阳、桐柏、宣化店回大别山去了。除看见他们在枣阳、宣化店发出的两次电报之外，以后就失去联络了，把我们留在荆（门）当（阳）远（安）的两个连队也带走了。

我们继续沿湘鄂边境之泥市向西前进。抵达白果坪附近，遭敌堵击。

## 白果坪“打虎”

白果坪（鹤峰县东北），盘据着“湖北省保安第九大队”500余人，是多年来占山为王的土匪，奸虏烧杀无所不为，人民十分痛恨，所以当地群众叫它的大队长邱世贵为“邱老虎”。

2月27日，我们出发到湾潭去。9点左右，尖兵排发现前进路上有敌人新挖的工事和鹿寨，当即向当地群众调查，原来是“邱老虎”在等我们到来。

敌人凭借1000多公尺高的左角寺，只有一条独路可上，并用火力封锁住我前进道路。如果我绕道前进则必须下20里路的山，再上20里路的山，这里都是高山峡谷，敌人正好追击。当然在敌火力之前钻树林也是可以绕过去的。

但我们想到：既然深山有虎，我们是专门来打虎的。干嘛要躲躲闪闪的？不如就此擒虎，为民除害。估计敌人追兵距我们还有一天路程，有时间打一仗。于是，决心消灭这只“老虎”再走路。

正面攻击都是悬崖绝壁，火力封锁甚严，我以九中队一个小队佯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住。以四、六中队（由冀述礼、王永生同志负责）迂迴到敌人的后方。

山峦确实险峻，根本无路可走，部队卸下东西只带武器由丛草中、峭壁上爬上去，连向导也找不到道路，完全要听正面的枪声才能判出方位。迂迴部队从10点钟出发，不停地攀登，一直到下午3点钟才绕到敌人阵地后面。

“邱老虎”傻乎乎地没想到集中火力堵住我军，不让我

攻上去。却没想到背后的山峰已为我二梯队占领，退路完全被截断了。

迂回的部队开始攻击了。正面也开始攀登。一时杀声震天，手榴弹的烟雾在斜阳下象一团团蘑菇云，机关枪、步枪打得象开了锅一样。敌人想夺路逃跑，同我反复争夺山头。在山峦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支敌军，是比较有战斗力的，不少人都是双枪（一长一短），攻击和防御的本领比一般国民党的正规军还要强，尤其是善于各自为战。

战斗一直打到夕阳西下，最后我以手榴弹、刺刀把敌拼垮。敌人溃散了，从悬崖绝壁上滚下去摔死者，不计其数。

“邱老虎”夺路逃生，这次战斗我们活捉了100多敌人，并缴了大批武器、弹药……

“邱老虎”逃跑了，他有一匹很会爬山的小骡子被我们缴来了。以后，大家就把那匹骡子叫“邱老虎”。它听惯了，只要一听人唤，它就摆尾巴，好象很得意的样子。

28日，天明之后，收集了一些战利品，继续向湾潭前进。中午抵达湾潭休息。可是，部队刚分散煮中饭，还未下米，敌33旅之98团就追上了。我为避免在此继续战斗，主动向茶丘方向撤退，

我一中队主力抢占右山岭，掩护主力转移，可是由于山大，绕道甚多。我主力撤出五、六公里，他们直到午夜1时才同我们会合。

3月1日，我们沿着一条狭谷，向北行进，中午到达茶丘之采花石。在峡谷中的一个半山坡上，有二、三十户人家，背靠大山，地形很不错。吃了中饭后，本想就地宿营，可是，我们刚找各中队干部来布置警戒时，敌人（98团）又跟

上来了。由于在湾潭我们让了他们一步，他们十分嚣张。

我当即一面向山上撤退，一面派两个中队在道路旁埋伏，待敌人追到距我只有百多公尺时，一声号响开始出击。可惜由于右翼九中队个别干部动作慢了，没有把敌人前卫营歼灭，让敌人窜回狭谷去了，只活捉了五、六个俘虏。

## 会 师

茶丘采花石战斗结束，已近黄昏。敌人不再前进了，我们乘夜向红芋坪转移。

红芋坪（鹤峰最东北与五峰的交界处）是1933年红二方面军后方医院的所在地。在周围要登25里山路的高山上，散居着100多户人家。只有三条小路通到山下，地形十分险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二方面军后方医院所在地应是鹤峰五里区的平山，这所医院建立于1930年冬，1932年6月转移。按情况分析，两军会师地点应在鹤峰五里区与五峰的龙潭区交界处，此地是否叫红鱼坪，待查。但鹤峰五里区的红鱼坪是不与五峰交界的。编者注。）

3月2日上午，我们到达红芋坪，准备以此良好地势休息几天。敌人再来就打他个落花流水。到达宿营地后，立即架上电台向中央中原局联络（此时中原局已在延安），报告我到达位置、战斗情况，并和李人林部联络。

由于近三天来，昼夜行军战斗，一直无时间架电台。三天前李部在鹤峰西南太平镇打过一仗，这几天去何方？不得而知。经半天加一夜，还是没有联络上。

3月3日上午，李部派两个侦察员来了。当天下午，我们就在红芋坪会合了。原来，我们在茶丘战斗时，他们就在西南几十里的山上，只因路程远，事先未联络上，没有配合打

这一仗，他们估计我们定去红芋坪，主动靠拢来的。在远离根据地，深入到长江以南敌人大后方的两支兄弟部队见面了。那种高兴心情，用文字和语言是怎么也无法形容出来的。

此时，为了统一领导，奉中原局电令，命名为“江南游击纵队”，以张才干、李人林同志为首组成临时党委会。调整力量（把我七中队——原为五团失掉联络的一个连160多人拨给李部），组成一、四两个支队，共1600余人（一支队400余人）。

休整了三天，敌198旅已达五峰，33旅之98团在湾潭。164旅由西南方向逼近，形成合围之势。我再向西行到石灰窑（恩施县境），为分散敌人兵力，然后分路经宣恩、来凤、龙山，南进到川鄂湘黔边境。

我四支队为东路，沿金鸡口（与敌164旅遭遇）、观音坪、红土溪、高罗（与敌保安队遭遇）、麻阳寨（敌保安队夜袭我）、李家河、茨岩塘到卡卡坝（龙家寨附近休息一天），这时遭敌保安队堵击，再向南（3月24、25日）到大窝坪（沅陵以北）。

西路，插恩施、宣恩之间南下，到招头寨、漫水而后东折，4月初在大窝坪再次会合。沿途打击敌人地方武装。敌整编56师之163、164旅、新17旅则从左右两侧和后面尾追。

## 内战中之内战

这是敌人大后方一个奇观，所以我把它记下来。

我们在大窝坪休息两天，等李人林同志来会合。李部来后又休息了一天。三天停留，敌人又形成了新的包围形势。

原打算东进去桃源、常德，那天刚走出10公里路，就同敌大庸县保安队遭遇。敌一触即溃，我继续东进，中午一

到达曾家河以西大休息，忽闻数里外有枪声。我不知其故，询问老乡，始知是慈利、桃源两县的保安队为边境纠纷，在那里狗咬狗地搞“武斗哩”！

我们考虑：先不收“渔人之利”，观其动静，让他们自己去撕打。就一面休息、煮饭，一面写了条子给慈利那个中队长，说明我们已陈军其后，如一反手必将其歼灭……那个中队长感激不尽，连忙派人来向我们“讨好”。并告诉我们：“国民党军33旅部队已由常德经桃源西进，围攻贵军，西、南皆有围堵，只北面是空隙，望贵军切勿东进，以向北行动为宜。”并再三说明句句是实话，否则，“不是娘养的”。

我们再三考虑：这个情况是合乎逻辑的，就改变原定路线，北折到溪口、澧水北岸，跳出了敌人又一次包围。事后证明，那个情况是确实的。

这里说明两个问题：（一）敌人内部充满了矛盾，可为我利用（那怕是暂时的利用也好）。因此，我们在江南游击活动中，凡不积极向我进攻者，我一般就暂时手下留情。（二）我党对俘虏的政策，影响是深远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初渡长江，在子良坪打敌保安队，部队正在追击，两个通讯员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敌人装死。两人使了一下眼色就故意说：“看样子没死，再给他一枪吧！”那个装死的敌兵惊恐地说：“同志，死了，死了。”“死了么，会说话？”于是，把他俘来教育释放了。

又一次，我支队在永顺以西行军，尖兵排发现有几个人（有穿军服的、有穿便服的），丢下东西行李就跑。我捡起来交给附近老乡，请他转交给丢失的人，部队就继续前进了。那几个人跑不远，看我们并不追他们，等队伍过完，就回来取东

西。一看东西一点未动，非常感动，恰好碰上我部一个掉队的小战士，他们就请房东杀鸡款待，看他脚上有病，立即找了一副担架送了20多里找到部队为止。那几个人中有一个是敌人的士兵，是请假回家的，他曾经在战场上被我俘虏受过宽待。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打击的是反动派，而不是下级士兵。只要他们停止抵抗就宽待他们。再来，再捉再放。

## 大 堰 挡 战 斗

4月，我们由溪口向东北经江垭、九溪（有小战斗）到达石门以北之王家厂、大堰垱宿营。

敌98团率四个营（加强一个营）紧紧跟上。次日拂晓先以一个营进攻我大堰垱（一支队），其主力进攻王家厂。

我一支队当即将其一营（98团第一营）击溃，并将其营长（谷泉）击毙。我采取咬一口就走的战术，待其主力赶上来，我即向西斋转移。

敌人继续跟到西斋，我在西斋以北山岗等了一天，他不前进，我即经刘家场到聂家河。敌人长江江防一时吃紧，把所有船只一律赶到江北控制起来。江防队在江内游弋防我抢渡。

## 磨 岗 阻 歼 灭 战

敌98团，象个大尾巴，你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不管是湖南也好湖北也好。但由于在大堰垱挨了一粗棍，他们行动非常谨慎，每天和我保持30里距离，不敢靠近。

而省保安大队则是各守边疆，你去了，他就跟上又是喊叫，又是冲打；你走了，他就又返回原防。尤其湖南省主席

王东原叫得特别响，到处请兵以保长沙（湖南除有省保安队之外，确实没有正规军）。为了能骗到一点军队去保护他，就拼命地夸大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尔虞我诈的手法，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以他们的军事情报来说，今天说：“共军2000”，明天就变成“共军5000”。在一个月之后就成了“共军10000”了。开始说：“有20挺机关枪”，不久就是“40挺”、“60挺”、“80挺”、乃至“100多挺”了。开始没说有炮，不久就说“有炮”，而且“有大炮许多门”（七、八十挺机关枪、三、四门六〇炮是有的）……

更为荒诞的是：说王定烈是“女性”，经过情报系统的捏造又变成“李人林、王定烈是夫妇”了。真是洋相百出。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这些奇妙的情报，当然有的是群众的有意夸张，说得十分神奇，故意吓唬敌人，而敌人那些情报员再去加工，就更显得玄妙了。

但是蒋介石的军队在华北解放区不断损兵折将，怎么也派不出多少正规军来。就是33旅也是被歼的残敌，调回补充修整的，也不得不倾巢而出。无奈何，王东原只好把他的省保安第11、18两个大队集中起来，派了个指挥叫王毓英的率领来找我们作战。

4月下旬，我由聂家河再向西南游击，由洞口到泥市。

4月26日黄昏前到达泥市，这里群众条件甚好。过江之后，就有20多个青年来参军。当晚获得的敌情是：湖南省保安第三总队的两个大队近千人，天黑已由石门急调磨市（即磨岗隘）堵我前进，后面“那条尾巴”距我们约有三、四十里。我向磨市再前进40里，他要跟上就要走80里，需要一整天。

前堵后追，这种日子我们过惯了，并不稀罕。我随便一

摆就可以过去。但是慑于敌人的追堵而不还手，会养成敌人的骄横，“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们应当有压倒敌人的勇气，但顾虑的是打下一些伤兵无法处理（这是自突围之后领导上最大的顾虑）。

最后，党委同志一致决定，要打这一仗，追堵相较，打击堵敌。这就叫“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以四支队进攻磨市，一支队向后警戒，阻敌追兵。

27日拂晓出发，约8时我支队向磨市之敌进攻。第一梯队由正面攻击，敌人火力相当猛烈，打了半小时无大进展。敌人扼守制高点，我火力展不开。我即以第二梯队从右翼迂回到敌侧后方。敌占据的地形虽然险要，但无坚固工事，都暴露于外，我轻重机枪、六〇炮射击特别有效。

国民党军队是很怕抄后路的，当我第二梯队在侧后一出现，敌人阵营即惊慌起来。我趁势猛攻，敌人一片混乱，纷纷放弃阵地逃命。可是逃路已为我所断。企图泅水逃命者，葬于渫河者数百。

此役，共战斗约两小时，敌两个保安大队（包括六个步兵中队，两个重机枪中队）一千零几十人，全部就歼。只王毓英带数十人坐船逃窜。毙伤敌100余人，溺死者数百，生俘800余人，我大获全胜，缴枪数百支，弹药10余万发（把枪交给泥市一个地下党支部，他们组织了一个游击队，

1948年渡过长江到江汉三分区）。

战斗结束了半天，天都黑了，那条“尾巴”才赶来，可是我已转移到南山。他只好向我打枪放炮，毫无作用。

战后，我争取贫苦的青壮年俘虏兵近300人补充部队，慢慢改造为我军战士，后来成为我战斗骨干。这一仗，我仅牺牲战士1名，轻伤9人。这是我深入江南以来最大、最彻